

差异中的一致^①

——《欧洲梦》第十三章

[美] 杰利米·里夫金

杨治宜 译

欧洲梦令人向往,但似乎有点儿像乌托邦,有点儿遥不可及。难以想象数亿人会团结在这样一幅宏图周围。不过照此说来,那么在中世纪晚期,人民会团结在民主价值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周围的想法,不也同样似乎纯粹是不可企及的幻想吗?问题在于,怎样一条崭新的共享的纽带才能够促使人们超越他们旧有的忠诚,而让欧洲梦变成可企及的普世梦想?简单说来——尽管这项任务绝不简单——我们必须情愿拓展我们的依附感,从基于地域的财产权和责任感拓展为基于我们集体参与、共同分享的地球之上的普遍人权和义务。

共享的脆弱性和全球意识

在怀疑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将这类观点贬为不可企及的幻想之前,容我先提出,在今天,全球化的力量已经使这一前景较之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有可能实现。

首先,人类的活动性正在增加,文化以离散聚居地(cultural diasporas)的形式正在非空间化,全球的公共空间也正在涌现,这一切使得财产权和狭隘的地区利益至少与过去相比在人类事务中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其次,人类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轮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古代,当人们在地区性的时间和空间里生活时,各种类型的脆弱性都同样是地区性的。对人们生存和安全的威胁都发生在家的附近。四围的荒野,嗜战的君主,疾病和瘟疫,它们的影响都很少扩展到地域之外。职是之故,应当给人们提供某种安全感的政

^① 原标题为:Unity in Diversity。——译注

权机构也是地区性和地域性的。而在现代,当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将人们跨越广阔空间带到一起,并以更高密集度的模式进行活动时,对人们生存和安全的威胁也同样扩展了。商业活动向更广阔地理空间的市场开拓,人类跨越广阔空间的活动性戏剧性增加,人类活动的步速和流速也大大加快。相应的,脆弱性也以同样的比例扩展到更高密度的时间和空间、速度更快的人类互动里。采邑和封城在它们保护自己公民的范围方面都显得过于狭隘有限了。结果便是民族国家的诞生。

今天,时空密度的增加促进了人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人类交流密度的戏剧性增长相应地又给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它们的效果常常是直接的,而范围则是全球的。恐怖主义、核战争的威胁、全球变暖、电脑病毒、人类克隆、海洋的死亡、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臭氧层空洞的扩大、区域性贸易市场丑闻以及其他种种事件,它们足以引发混乱,颠覆世界的秩序。

民族国家受到太多的地理限制,因此不能够有效应对全球的威胁和风险。不仅如此,民族国家的设计理念就是要保护财产、捍卫疆土。它们是排外(exclusive)而非包容的(inclusive)统治制度。它们从没有被设想过要成为应对全球风险和威胁的工具。

然而,倘若数百万人,甚至数十亿人,相信对他们安全的全球性威胁至少与他们每天面对的更加地区性的威胁同样真实、同样危险,那么将会有什么后果?强调这些威胁将会要求人类达成一项新的契约,扩展他们的义务、忠诚及安全观,不仅超越地域的狭隘限制,也超越财产权和公民权所提供的更加有限的保护。

普遍人权将是我们人类物种进化史的下一政治篇章。某些普遍人权的拥护者错误地相信,提倡人权的根源乃是利他主义,并仅仅由善意所推动。尽管利他主义和善意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人权还有它的另一面——其源泉乃在脆弱感及对安全的需求。戴维·比瑟姆(David Beetham)写道:“面对共同的威胁正如共同的人性一样,都证明了一个主张,即:人权计划乃是普世性的。”^①

人类首次意识到人性所共享的脆弱性是在1945年,当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

^① Beetham, David, "Human Rights as a Model for Cosmopolitan Democracy," In Archibugi, Daniele, David Held, and Martin Kohler, eds. *Re-Imagining Political Community: Studies in Cosmopolitan Democra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988. p.60.